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中国

政治发展进程

CHINA 2016 年

时事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2016

中国

政治发展进程

CHINA 2016 年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2016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
公共管理研究所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80232-940-9

I. ①中… II. ①上…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2016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831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10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主 编：刘 杰

编写组成员：张树平：第一章

齐凌云：第二章

郭中军：第三章

李佳佳：第四章

朱淑丽：第五章

李锦峰：第六章

石冬旭：第七章

朱雯霞：第八章

骆明婷：大事记

目 录

第一章 超越与回归：构建“基于发展的治理型国家” 的新行动与新征程	(1)
一、2015 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评估	(2)
二、中国政治建设的核心原则：战略规划与发展 规律的统一	(6)
三、2015 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面向	(9)
四、超越—回归—超越：走向“基于发展的治理型 国家”	(47)
第二章 执政党的建设：全面从严依规治党	(54)
一、反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	(54)
二、优化党员队伍、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	(68)
三、“三严三实”：改善党员干部作风	(77)
第三章 国家制度建设：构筑制度自信	(81)
一、国家制度建设的民主、法治之维	(82)
二、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90)
三、“协商民主”引领下的政治协商制度	(111)
第四章 政府改革：重建政府与市场关系	(123)
一、持续推进各级政府简政放权	(123)

二、加强和改进政府市场监管	(134)
三、实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141)
四、打造透明、廉洁政府	(149)
第五章 依法治国全面开局	(154)
一、重要立法聚焦	(155)
二、依法实施法治政府建设	(166)
三、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	(177)
四、司法机关改革	(185)
第六章 转变基层自治体制架构	(197)
一、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	(197)
二、城乡社区机构进一步减负	(212)
三、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内容与形式	(221)
四、基层反腐倡廉新探索	(229)
五、稳定和规范基层社会	(239)
第七章 双向度推进社会治理	(250)
一、以精细化社会治理破解民生难题	(251)
二、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260)
三、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	(268)
四、社会治理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274)
第八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全球关注	(279)
一、海外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面相	(280)
二、中国式国家治理的国际解读	(288)
三、世界对中国军队改革反映强烈	(300)
四、中共自身建设和自我修复之世界观	(306)
大事记	(310)

第一章 超越与回归：构建“基于发展的治理型国家”的新行动与新征程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建构与演进的统一体，是战略规划、行动与现实政治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的历史时空、新的外部环境、改革新阶段、新经济与新社会，以及由新风险重新谱写的新政治议程，构成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新旧环境的变化或者转换，一方面向当代中国政治建设提出了若干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实现制度崛起、如何重启改革、如何护卫社会、如何化解风险等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一条核心原则——战略规划与发展规律的统一——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2015年中国政治建设各领域既因应着各自的问题，又相互关联、融为一体：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加速推进，通过战略转变、机制建设、结构优化和动力升级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思路，经济民主性要素进一步成长；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扎实推进，筑牢社会保障、优化社会结构、增进社会公正、培育个体成长成为重点，社会自主性进一步提升；行政改革在多重约束下积极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权力关系调整及行政理念创新成为亮点；执政党的建设科学布局，以组织人事为突破，以依规治党为中介，以能力培养为归宿，执政党驾驭改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制度建设稳中有进，制度需求与制度功能的对接成关键，制度崛起的空间进一步拓展；法治建设全面推进，通过同步立法、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培育，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法治效应进一步植入中国政治发展之中；

正风反腐取得阶段性成果，战略性反腐态势基本形成，反腐的制度建设效应初步显现。

从中国政治建设 with 政治发展的中波段与长波段来看，自 2002 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处在超越“发展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虽然这种超越只是针对“发展型国家”模式而采取的理性建构的修正行动，但鉴于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超越“发展型国家”的建构行动却有可能将中国政治发展导向一种面向“治理型国家”形态的复归。不过，这种“治理型国家”并非向中国传统治理型国家的复古，而是一种“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2015 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新行动，正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向建构新治理型国家的新征程。

一、2015 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评估

“一国的政治发展，通常是该国政治生态环境与其政治发展意愿、能力、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客观评估 2015 年中国政治发展生态环境，就成为我们理解和分析 2015 年中国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发展环境有变化的一面，也有连续的一面，因此在对政治环境的分析中，既需要看到这种连续性，也需要彰显这种变化性。这就使得对政治发展环境指标的选取成为关键，相对稳定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政治发展环境及其变迁的理解与比较。

第一，中国历史周期的长波段与短波段。时间是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中国政治建设总是处在绵密交织的时间之网中。2015 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位于“十二五”的收官之年，是“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过渡期与衔接期。这一年，中国出台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规划，都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放在“2020”上，也就是“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

“一百年”。这一阶段有许多重要的时代特征，比如中国经济面临的“三期叠加”特征；这一阶段也提出了许多重要时代课题与历史任务，比如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与政治建设；这一阶段聚焦重要的预定目标，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5年是改革开放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年，距离辛亥革命和帝制覆亡已逾百年，民族复兴与国家建设的希望与责任同比增长，文化与文明复兴开始成为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

第二，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中国已经超越依靠外界机遇闷头发展自己的时期，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国际责任，更主动地构建自身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②；2015年年内，“亚投行”协议正式签署，中国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进，中韩、中澳、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协议正式签署或升级；“竞争—合作”的新型国家间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中国在联合国经常性预算分摊比例升至7.92%，位居第三；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等20国就各国应遵守的网络空间初步行为准则达成一致；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社会治理已成事实，^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境外或者全球范围内布局”。^④概言之，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另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本身也越来越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作用是具体并且深刻的，它使得对政治制度、政府体制、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横向比较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崛起，最终必须归因于制度崛起，尤其是基础

① 傅莹：《世界很想听中国故事，窗口已打开》，《东方早报》2015年12月13日。

② 杨群：《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解放日报》2015年6月18日。

③ 朱珉迕：《欢迎境外NGO，靠的是改革自信》，《解放日报》2015年7月28日。

④ 李稻葵：《回应当前国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对中国是否有实力改变国际经济规则的思考》，《北京日报》2015年8月3日。

政治制度的崛起。

第三，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表征。改革原本是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工具与手段，但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它早已超越工具性价值的意涵，其本身便成为合法性赋予的一个重要来源。换言之，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一种“改革政治”，改革本身就是正当性的来源之一，所以“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只能全面深化，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以“全面改革”为特征的阶段，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着影响深远的重要变化，“二次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呼声在执政党、政府和社会中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但同时，“处长政治”、“改革中梗阻”、“制度过密化”等现象引起的广泛关注也说明，当前中国改革必须在提升“改革穿透力”方面，在重建法治与规则方面，在改进中央顶层设计和促进央、地改革的互动方面，在培养全社会改革共识和“改革促进派”方面进一步突破。中国政治体系如何获得再次启动改革攻坚的能力与资源，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建设的一大考验。

第四，新经济与新社会。政治建设需要从经济发展中汲取资源，需要从社会发展中巩固其合法性。这是因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关系到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以及在个体基础上基于不同原则、手段与技术组成的各种群体或阶层的各种权利。政治终归是人的政治，而人总是生活在经济和社会之中，因而经济与社会从根本上规定着政治的起源与归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总是倾向于将政治发展拉回其初衷。此二者之中，经济是基础，社会是核心，合法性认同直接从社会公正中产生；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容易放大各种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公正不仅是一种客观量度，而且是一种主观感知。2015 年，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成长紧密结合在一起，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急剧上升，不仅因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凸显了社会个体及相关阶层社会权利的重要性，更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内在需要唤起了千百万经济主体与社会主

体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行动。同时，互联网对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日渐深入的覆盖，也正在改写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形态，尤其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一方面共享性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自身组织、动员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和社会领域本身存在的问题，既提供了中国政治建设的难得机遇，也向中国政治体系提出了若干现实挑战。

第五，矛盾、风险与新政治议程。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素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对现实政治、社会风险的主观体认，因此兼有主客二重性。在任何时代与任何社会，矛盾与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政治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否认属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代问题和现实的各领域的矛盾与风险；而中国社会尤其是执政党对这种现实风险与矛盾的判断、认知与战略应对，构成了当前中国政治建设的议程版图。换言之，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与风险及其结构，最终决定着现实政治发展中的优先性议程。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面临的现实风险，就其大略而言，譬如改革进入攻坚期的风险和改革停滞的风险、政治参与爆发性增长的风险、社会断裂的风险、腐败扩散的风险、执政党能力衰退的风险、外部压力与外部干预的风险、思想混乱与意识形态失守的风险、生态环境和生态危机恶化的风险、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有效支持不足的风险等等，一定意义上正在改写和修正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议程图谱。比如，2015年8月，由中组部、监察部、发改委、环保部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由中办、国办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及年内多地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中生态环境指标的制定，实际上就体现了政治系统对于发展优先性的回应与调整。

二、中国政治建设的核心原则：战略规划与发展规律的统一

中国政治体系如何回应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具体来说，如何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如何实现中国的“制度崛起”？政治体系如何获得再次启动改革攻坚战的资源与能力？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如何护卫中国社会成长？如何有效化解政治风险并重谱中国政治建设的优先性议程？这就涉及到对中国全面发展以及中国政治发展自身的战略设计与战略规划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中国发展所处阶段、问题与目标的战略应对，政治建设在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枢纽性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有赖于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系建设，包括政治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首要的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全面增强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全面依法治国，从政治学角度看其核心在于如何实现法律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其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命题。

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最后都汇集到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有效性这个焦点问题上。那么最终的问题就是：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如何确保其有效？这个问题并非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015 年，俞可平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中指出，领导到地方去调研为什么往往得不到真实数据，其原因在于违背了一条政治学的基本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通道；而“党内法规这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是因为当前中国廉政建设的某些制度设计忽略了另一条政治学规律——权力不但要受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因此，要解决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中制度、政

策、措施“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就必须从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入手。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有两个维度：其一是建构的维度；其二是演进的维度。所谓建构的维度，突出的是作为政治建设的主体，譬如执政党、政府或其他社会主体，基于利益、理性、战略、策略的行动及其后果。所谓演进的维度，是指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演进的面向。换言之，中国政治发展不仅表现为政治主体行动的结果，同时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建构的维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规划相关，演进的维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相关，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必须兼顾这两个维度，并最大限度地实现战略规划与政治发展规律的统一，才能确保中国政治发展的有效性。

从“演进”的角度来说，所谓“规律”问题，是指在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中有必要准确识别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阶段性特征和长远性趋势，尤其是需要重视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三个明显变化：

第一，深度关联。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议题中，我们既能发现比比皆是的两难问题，也能发现比比皆是的重合性或者汇集性议题，如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政党领域、文化领域议题的深度汇集或交叉。比如，2015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清理重组“僵尸企业”，就体现了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又如，2015年经济工作中备受关注的企业减负议题，就直接牵涉到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关税费及社会保险、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诸如市场机制建设、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等多领域改革的深入推进。上述现象提醒我们，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度关联的历史阶段。

第二，精致平衡。与“深度关联”相关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政治发展日益进入一个“精致平衡”的时代：当前中国几乎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比如央行的降息降准、民间借贷、户籍政策、生育政策、养老保险、教育与医疗制度改革等，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与社会讨论，“同质性的社会共识”正在让位

于“重叠性的社会共识”或者“结构性的社会共识”。因此，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在“五大建设”或“六大建设”之间，在政治领域内部诸如政治与法律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甚至在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在长远与当下之间精心权衡、广泛协商、审慎推进。

第三，责任政治。随着“风险社会”时代的来临，任何一个政治主体都无法独自把所有责任扛在肩上，因此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坚持责任分担、风险分散的基本原则，务必真正使市场的职能归之市场、政府的归之政府、执政党的归之执政党、社会的归之社会，构建与市场化进程和社会成长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结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执政党不能也无法大包大揽，更不能越俎代庖。检验执政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一是看执政党是否通过政党建设自身和相关改革的推进培养了负责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主体；二是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诸如互联网、大数据等具有政治衍生性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切实改变现实政治中权力与责任不匹配、政治与法律不匹配、潜规则与明规矩相冲突等名实不符的政治现象，促进责任政治的真正落实。

在此基础上，在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中，要实现战略规划与发展规律的统一，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对关系：一是“名与实”——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规治党、数字治理、透明政府建设、监督体制的完善，应当聚焦于切实改变现实政治中某些“名”、“实”两张皮现象，聚焦于真正形成“循名责实”的政治生态与政治环境；二是“变与常”——其核心是要求当前的政治建设不能仅仅考虑一时、一事、一地的应对之策，一项政策的出台、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进，不能仅仅着眼于“应急”和“摆平”，着眼于一年两年的权宜之计，而应当立足于当前政策与中长期规划的结合，立足于当前政策效应与中长期影响的平衡，立足于政策之间、领域之间的平衡；三是“中与西”——在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中，务必坚持古今中外的开放式的历史时空观，尤其必须重视如何形成

中国基础性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相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治理结构的比较优势，这就要求中国政治建设坚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基本原则；四是“中央与地方”——在当前中国政治建设 with 政治发展中确有必要加强中央权威以统筹推动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但在“全国一盘棋”的背后，如何确保在增强中央政令执行力的同时保持地方自主改革的动力、活力与积极性，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2015 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面向

遵循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与逻辑，2015 年中国政治建设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持续推进，并形成了明显的年度特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新常态是理解 2015 年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它不仅深刻改写了中国的经济战略，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深刻调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重谱了当下中国发展的优先性议程和系统性目标，更重要的是经济新常态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某种变革的压力和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新常态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不过，政治体系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和应对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而是将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成长一并纳入政治发展的战略规划之中，这就使得当下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时具备了政治发展的意义。

（一）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重构新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经济以一种越来越明确和不可逆转的方式进入一种新常态，经济系统以“可持续发展”为题不断向政治体系提出诸多不同于以往的内在诉求，同时政治系统在新经济常态下汲取资源的方式、能力和限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导致一些传统的行政

方式或者执政方式遭遇困境，于是从经济体系出发投射到政治领域的诉求及议题积少成多、积量变为质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亦只能积极求变，并力图通过自身的战略应对来积极影响经济发展，于是政治与经济的交融就逐渐展示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这种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战略、机制、结构、动力。

第一，总体经济形势变化引发中国经济战略的变化。从周期来说，中国经济基本面临深刻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深刻地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思维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影响。2015 年 9 月，李克强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形势“形有波动，势仍向好”，这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变化中两个面向的高度概括：其一是对基于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周期叠加而产生的有形的、下行的经济压力的承认；其二是对中国经济调整中潜在的、未来的成长性力量的判断与预期。当前，作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国经济正面临深刻变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高成本时代来临、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互联网颠覆传统行业、城镇主导社会来临、区域融合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以及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三大发动机取代传统“三驾马车”成为经济新动力。^① 面对这种变局，传统的经济评价指标比如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银行贷款等难以准确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现实，必须通过更为丰富、更为合理的微观指标体系和宏观观察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基本面，比如从经济潜力与政策空间、结构优化、商业模式升级等结构性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走向。^② 在中国经济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经济增长质量而非速度成为首要的考量。^③

面对此一阶段中国宏观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如何采取合理战略与措施以期避免经济系统性风险，这就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

① 李佐军：《中国经济十大变局》，《中国经济时报》2015 年 11 月 11 日。

② 林毅夫：《新常态下经济热点问题辨析》，《北京日报》2015 年 5 月 4 日。

③ 厉以宁：《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保持 5%—6% 即可》，中国新闻网，2015 年 10 月 29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5/10-29/7595814.shtml>。

下经济新战略的问题。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这表明中国经济将由投入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2015年11月，李克强在《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克强指数”三个指标与经济运行状况之间的关联指数已发生变化，中国未来会更加关注就业、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从而构成了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克强指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经济与民生、就业与环境并重阶段。^①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被视为官方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重要转变，^② 这将带来中国经济思维、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创新驱动战、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企业减负、共享发展等导向性经济策略的推进中孕育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新机遇。

第二，市场机制建设加速推进。市场机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经济机制或者经济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治理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要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天然地牵连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崇尚法治、开放、平等、自由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对政府角色与行政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有着严格的要求。建设更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当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具有尤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意义。

2015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持续简政放权、企业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8月，国务院同意在上海、南京、郑州、广州、成都、厦门、青岛、

① 《“新克强指数”释放了什么信号》，《第一财经日报》社论，2016年11月24日。

② 马光远：《从需求到供给，中国经济思路之变》，《新京报》2016年11月17日。